

跨世紀的中日關係

——回顧近代日本的對華政策

• 橋爪大三郎

日本與中國不僅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而且在歷史上也有着悠久深遠的往來關係。進入新世紀後的中日兩國是像過去的法國與德國那樣，國境相鄰卻視對方為宿敵而相互爭鬥呢，還是像隔洋相望的英國和美國那樣，即使偶有交戰，也以維繫一種永續不變的和平關係為其基本宗旨呢？當然，我們都希望出現後一種狀況。為實現這個目標，中日兩國必須作出一定的努力，勇於面對並積極跨越目前仍處於曖昧狀態的歷史遺留問題。

為此，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本世紀以前的中日兩國關係，進而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中日關係。

一 即將解體的中華帝國與新興國家日本

二十世紀初，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被解體的生死關頭，正好與憑藉明治維新而成功脫離舊體制、日益興盛的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隨着中日在朝鮮半島的衝突不斷升級，1894年終於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這次戰爭既體現了兩國在朝鮮權益上的對立矛盾，同時也反映了中日兩國相互衝突的世界觀。

清朝政府無法從其中華大帝國的傳統世界觀中脫離出來。這種世界觀認為，中國是世界的核心，周邊國家均是屬邦；通過向中國朝貢而形成的「夷夏秩序」是其根本。儘管出現了實力遠超中國的歐美列強，但是，正因為對西方的不理解，中國反而更加拘泥於其所固有的世界觀。日本則很早就意識到那種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的，因此，一旦有了和西方文明接觸的機會，日本就開始明治維新，其目的無非是創造一種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態勢，使日本成長為足以與歐美諸國平起平坐的近代化國家。然而，日本要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首先就必須獲得與中國對等的地位。因此，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半島支配權而產生的各種衝突，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日本很早就意識到，那種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的。因此，日本要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首先就必須獲得與中國對等的地位。因此，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半島支配權而產生的各種衝突，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日俄戰爭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巨，是中日甲午戰爭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因為，作為一場亞洲國家同西歐近代化國家進行的戰爭，黃色人種破天荒取得了勝利；同時，它又助長了日本擴張的野心，日本從此開始不斷侵略中國國土。

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完全捨棄了原本就徒有虛名的儒教，以西方化的國際政治原則重新認識東亞局勢。朝鮮則截然不同，仍恪守儒教原則，絲毫不理解近代化的必要性，因此，極有可能會淪為某個列強（如俄國）的殖民地。為了防止朝鮮半島一旦成為外國的殖民地而威脅到日本的獨立與安全，日本認為應該先下手為強，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日本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竟得到了警惕俄國東進的英美諸國的支持。

清朝政府一向認為朝鮮是其屬邦，作為宗主國，一旦朝鮮出現混亂，理所當然地應派遣軍隊加以平息，並制止日本在朝鮮權益的不斷擴張。與此針鋒相對，日本則提出自己與中國同為平等獨立國家的主張。

日本對朝鮮的處置是有計劃的：第一步先使朝鮮擺脫從屬中國的地位，繼而把它變成受日本保護並從屬於日本的國家。在中日甲午戰爭的開戰敕詔中，日方聲稱是為了「朝鮮的獨立」，而日本在戰勝後卻不斷加緊朝鮮的屬國化，並最終奪取了對朝鮮的支配權。到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

脫胎為近代化國家的日本，很快便顯露出對周邊地區領土的擴張野心。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西方列強都在忙於對該地區的吞食擴張，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隨着中華帝國的不斷解體，東亞地區出現了一定的權力空白，不穩定的國際秩序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野心。日本對外領土的擴張是得益於中華帝國的解體，與此同時，日本的擴張反過來又加速了這個解體過程。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曾討論過進攻台灣，但最終沒有實行。由於在黃海海戰及攻擊旅順口的戰役中，日軍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日本政府對清朝的胃口也就越來越大。經過多次交涉，締結了《馬關條約》，除保證日本對朝鮮支配外，清政府同意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並支付巨額賠款。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擔心這樣會引起外國勢力的干涉，而結果的確是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之下，不得不歸還了遼東半島。此後不久，俄國便將其權益範圍擴張至遼東半島及東北，對朝鮮半島形成包夾之勢。而且朝鮮國內的親俄派活動十分活躍，可以說日俄衝突已無法避免。

日俄戰爭（1904-1905年）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巨，是中日甲午戰爭所無法比擬的。這是因為，作為一場亞洲國家同西歐近代化國家的戰爭，黃色人種破天荒取得了勝利；同時，它又助長了日本擴張的野心，日本從此開始不斷侵略中國國土。

日俄戰爭後，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實力對比基本保持均衡（即相互承認彼此的權益）。為此，日俄之間曾簽訂了四次秘密協議，瓜分了東北的權益（美國也曾對經營南滿鐵路表現出濃厚興趣，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斷然拒絕）。然而時隔不久，這種勢力的均衡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首先是由於清朝的滅亡及中華民國的建立，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其次，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損耗了歐洲列強的實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對亞洲地區「心有餘而力不足」。日本便趁此機會，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企圖進一步擴大在華利益。第三，則是因為爆發了俄國革命，俄國勢力不得不退出東北。日本曾為此與美、英、法聯合出兵西伯利亞，但因不守信用長期駐紮大量軍隊而招致其他列強的強烈不滿。

日本將其勢力範圍滲透至因俄國退出而出現的權益空白地帶，當時的中國政府卻因北洋軍閥的混戰無力對此稍加抵抗。原本就受到日本支持的張作霖也在東北不斷擴大其勢力，漸漸地為其主子所不容，最終被關東軍暗殺。日本駐紮在東北的關東軍想方設法，使東北成為一個排他的、完全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

二 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

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無疑已成為東亞地區的軍事強國，為了擴大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就在1931年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並於翌年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將整個東北完全置於日本的軍事統治之下。

那麼，日本最初為甚麼策劃九一八事變，進而成立「滿洲國」呢？

從1907年制訂的「帝國國防方針」來看，當時日本是以俄國為其陸軍的假想敵，而海軍的假想敵則是美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完全是由於陸軍的參謀本部和海軍的軍令部各自為政、分別制訂戰略政策而造成的，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裏，兩個部門也未就此作出任何調整。這就意味着日本的軍事指揮部門並未認真地考慮過日本到底應該在怎樣一種情況下，為了甚麼目的，去決定與俄國（蘇聯）交戰還是與美國爭鋒。正是在這種缺乏統一戰略的情況下，日本加緊了對中國一步一步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主謀者之一的石原莞爾中佐（當時的關東軍參謀），在事變前曾著有《戰爭史大觀》、《作為國運昌隆基本國策的滿蒙問題解決案》等，他聲稱：「因為漢民族無法維持其自身的治安，所以，由日本佔領滿蒙並指導中國的政治，這不僅是有關日本存亡的大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講也是一種幸福。」石原參謀堅信必須軍事佔領東北，以備緊急避難之需。其實，如果東北真的落入日本手中的話，北有蘇聯，南與中國國境相接，一旦出現戰事，反而會陷入腹背受敵的戰略困境。正是由於上述原因，石原參謀後來對侵入中國並進一步擴大戰爭持反對立場，但他的意見在陸軍內部十分孤立，最終失去了影響力。

日本的陸軍有一個特點，它非但不服從文官政府（內閣和國會）的指揮，甚至無視參謀本部制訂的方針及關東軍參謀部的命令，往往由現場部隊擅自採取軍事行動，並進而擴大行動的規模。究其原因則有許多，其中之一就在於所謂「統帥權的獨立」（軍事指揮權不在政府而歸屬天皇，即軍隊獨立於政府）。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把軍事指揮權同政府機關割裂開來。不過，當初的政治家們還是發揮了一些統帥軍隊的功能。例如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出席大本營（戰時所設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的協議機構）會議，撤換了無視參謀本部方針、一意主張進攻北京的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按照規定，若要動用駐紮在國外的軍隊，必須先由參謀總長向天皇提出申請，在取得敕詔後方可發出命令，此外在獲取天皇批准之前，還必須由內閣認可所需的出兵費用。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本來可以通過製作預算

日本為甚麼策劃九一八事變，進而成立「滿洲國」呢？從1907年的「帝國國防方針」來看，當時日本陸軍以俄國為其假想敵，而海軍的假想敵則是美國。日本的軍事指揮部門並未認真地考慮過在怎樣的情況下，為了甚麼目的，決定是與俄國還是與美國交戰。正是在缺乏統一戰略的情況下，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

的方法控制軍隊，但是，軍隊方面又可以採用陸軍大臣遞交辭呈的方式迫使政府認可相關的既成事實。由於法律規定陸軍大臣必須是現役軍人，所以，只要陸軍不提出大臣人選，那麼內閣就只有提出總辭了。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升級和國際關係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構築了一種後來被稱為華盛頓體系的國際協調體制。在華盛頓會議(1921-22年)上，簽署了確定美、英、日等主要國家主力艦擁有率的《海軍軍備緊縮條約》，維護太平洋地區穩定的《四國條約》，以及保證中國獨立、領土完整、各國機會均等的《九國條約》等共七個條約、兩個補充協議。參加有關中國問題《九國條約》簽署的九個國家是：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簡而言之，這個條約明確規定了不允許某一國獨佔中國這個大市場，中國應對各發達國家平等開放，各國享有相同的權利，保證利益均沾。隨着《四國條約》的生效，日英同盟自動廢止，這就意味着國際社會今後不再支持與容忍日本像中日甲午、日俄戰爭那樣的行為。然而，當時的日本並未充分認識到國際社會已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由於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和集團經濟盛行，發達國家的協調體制暫時處於不穩定狀態。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

三 七七事變與太平洋戰爭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的戰爭就此全面展開。然而，這次戰爭未如日本政府及軍部速戰速決的原始意願，陷入了泥沼般的持久戰、消耗戰。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日美關係逐漸惡化，並因此導致日本在1941年12月對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最終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而結束。

那麼，當時駐華部隊的指揮官(參謀們)為甚麼不放過任何機會，極盡謀略地投身戰鬥以期擴大其佔領區呢？陸軍的一貫主張是備戰蘇聯。1941年，為了響應德國對蘇宣戰，日軍就曾在東北集結了70萬部隊及相應物資，稱之為「關特演」(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戰爭一觸即發。正是出於上述目的，關東軍認為必須確保與中國國境相接地區的安全，以免腹背受敵，因此以擴大佔領區為上策。然而，這種行為引起了中國國民的極大憤慨，反日情緒空前高漲，中國軍隊也進行了頑強抵抗。其結果使得日軍為了所謂「安全保障」而不得不投入更大規模的軍事力量，進一步擴大侵略形成惡性循環。只是當時的日本軍方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日本陸軍中的官僚(尤其是參謀們)只關注那些事關眼前利益的戰術謀略，卻忽視了戰略思考，完全陷入主觀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便產生了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傲慢自大情緒。

松井石根大將(進攻南京時的華中方面軍司令，在東京裁判中以指揮南京大屠殺的罪名被判處死刑)是陸軍裏有名的中國通，他曾形容道：「在一個家庭

1941年，為了響應德國對蘇宣戰，日軍就曾在東北集結了70萬部隊及相應物資，稱之為「關特演」，戰爭一觸即發。關東軍認為必須確保與中國國境相接地區的安全，以免腹背受敵，因此以擴大佔領區為上策。然而，這種行為引起了中國國民的極大憤慨，反日情緒空前高漲。

裏，兄長在忍無可忍之下教訓了不斷惹事生非的弟弟，這種行為只不過是促使弟弟好好反省反省的手段。」也就是說，他認為日本是地位優於中國的「兄長」，而中國人民基於民族主義的抵抗運動則被視為「惹事生非」。

出於這樣的一種思路，日本侮辱中國，並為擴大侵略製造各種理由。

理由之一在於，他們認為中國自甘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日本當時頂住了西歐國家的威脅，通過明治維新而最終使自己享有同歐美列強完全平等的國際地位。尤其是到了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便自認為是已可以和歐美諸國平起平坐、獨立的近代化國家。這種想法構成了日本人自尊心的核心，他們認為，既然已經取得與歐美平等的地位了，那麼，日本和淪為歐美殖民地的中國之間的關係就不應是平等的，日本必須凌駕於中國之上。

理由之二在於，日本人不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由於恪守其傳統與原則，沒能比較靈活地、策略地應對西方國家的進攻。日本人大多因此認為中國人缺乏適應能力，是不識時務的民族。其實，這是對中國文化的偏見，日本人似乎患上了健忘症，忘記了自己過去只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個附屬小國。而後來日本軍事上的勝利，又進一步強化了上述傾向。

理由之三在於，日本人普遍認為中國已經分裂了，不再有還手之力了。在日本，民眾視天皇為近代化的象徵，並在其領導下成功地完成了國民國家的建設。而清朝的皇帝則與之相反，無法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中國必須尋找另一條出路，為此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分裂局面，直到1937年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才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民族主義陣營。可惜當時的日本人大多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侮辱中國的行為既反映了日本很難認同中國為平等國家的思想，與此同時，又可以說這體現了日本對中國的依賴。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頒布了名為「東亞新秩序」的宣言，聲稱立志把日本、「滿洲國」以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這個宣言出台後，美國鑒於日本七七事變後不斷擴大其佔領地，認為日本已脫離華盛頓體系，作為一名無視歐美諸國權益的侵略者繼續其戰爭行為。結果，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在加強對日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對中國提供實質性的軍事及經濟援助。

另一方面，日本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很難確定國家的基本戰略：如果與蘇聯交戰，不斷擴大的中國戰線及日益惡化的日美關係都將成為其不堪承受的沉重負擔；如果向美國宣戰，就有可能失去石油等戰略物資的補給來源。如果想要避免戰爭，則必須撤出中國和東北，而這又是萬萬不可能的。結果，日本經過百般權衡，選擇了毫無勝算的對美開戰，以及為獲取石油而展開的南進行動。

為了使上述南進行動正當化，日本開始大肆鼓吹「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即要實現東亞乃至更大範圍的解放，建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就是保衛這一「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當然，中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承認日本這種欲稱霸整個東亞地區的戰略野心的。於是，由此而開始的太平洋戰爭以1945年日本的完全失敗而告終。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頒布了名為「東亞新秩序」的宣言，聲稱立志把日本、「滿洲國」以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大經濟圈。這個宣言出台後，日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在加強對日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對中國提供實質性的軍事及經濟援助。

四 戰後冷戰體制與中日關係

日本的對美戰爭是一場毫無戰略規劃的戰爭，作戰目的既不明確，也缺乏戰後媾和的任何設想。同發動七七事變時一樣，日本仍幻想着憑藉戰爭初期的勝利，迫使對方喪失鬥志而主動求和。但事實卻是，美國決心堅持戰鬥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這次戰爭的結局本就在美國政府的意料之中，倒是中國國內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共內戰在日本戰敗後不久即全面展開，而且最終的結果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被趕到台灣孤島，中國大陸成立了共產主義政權。這對於美國也就意味着，它所希望的將中國劃入自由主義國家範疇的努力失敗了。隨着日益嚴峻的美蘇對立，戰後國際社會逐步分裂為冷戰狀態的兩大陣營。

日本在宣布失敗後，依照《波茨坦宣言》放棄了台灣、朝鮮半島、滿洲等殖民地，隨後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當局的領導下，起草了新的憲法，其中載入了「放棄戰爭」的條款。1951年，承認日本恢復獨立的《舊金山條約》得以簽署，當時還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不允許日本再擁有軍備。上述條約還同時提出，美國會保障日本的國家安全。在嚴酷的美蘇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橋頭堡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加，從而才能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復興戰後經濟。

不允許日本擁有獨自的軍事力量也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擁有獨自的對外政策和世界戰略，即使恢復獨立以後，也必須繼續置於美國的管理之下。自衛隊就其裝備來看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軍隊，但憲法規定了它不是軍隊，和警察一樣，它受到一般國內法規的約束，不能在國外進行活動。在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事實上是不存在脫離美國採取獨自行動的可能性，比如，同蘇聯、中國的接近，締結和平條約，等等。因此，在戰後約二十五年間，日本也就不會有甚麼對華政策了。

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同年10月中國又恢復了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翌年，尼克松總統也實現了中國之行，中美恢復邦交。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不僅牽制了它的主要敵手蘇聯，而且有利於整個東亞地區的穩定。而中國通過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也為其自身的安全保障及未來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雙方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性和解，為中國始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客觀外部條件。

中美之間的「越頂外交」（對日本而言），的確使當時的日本政府十分困惑，但同時也促使日方產生恢復中日邦交的強烈願望。中日邦交正常化當然包括處理兩國戰爭的遺留問題。關於日本的政治責任（對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等一系列侵略行為所應負的責任），東京裁判已做出了裁決（中華民國政府參加了東京裁判，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還未成立）；關於國家賠償問題，蔣介石曾宣布放棄要求權，因而沒有進行，北京政府對此向來也沒表示明確異議。

同西方改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改變其性質的重大抉擇，也可以說它影響了中國以後的發展道路。事實上，中國在此基礎上才能較早（比柏林牆的崩潰早了10年）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中國藉此才能在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社會中立於不倒的地位。

我認為，同以往相比，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的中日關係會有以下幾個不同點：

第一，東亞地區不再像二十世紀前半期那樣，只是一個與世界其他部分相

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當局的領導下，起草了新的憲法，其中載入了「放棄戰爭」的條款。在冷戰體系之下，日本事實上是不存在脫離美國採取獨自行動的可能性。因此，在戰後約二十五年間，日本也就不會有甚麼對華政策了。

對隔絕的地域，而是與整個世界緊密地一體化了。僅靠該地域的當事國已無法決定東亞地區的命運。

第二，日本與中國憑藉其互補性成為該地區的基軸。一種既不同於傳統上以中國為核心的夷夏秩序，又不同於近代以日本為核心的大東亞秩序，更不同於冷戰時期的隔斷局面，開始出現中日兩國的平等關係。只是這種關係又各有側重：中國是一個政治、軍事大國，日本則以經濟大國的面目出現，互補互利。並且，美國的東亞政策會盡量調停中日兩國間的矛盾。

第三，包括日本、中國及周邊各國在內的整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將十分巨大，其市場佔有率可以和現在的美國相匹敵。東亞地區不僅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反過來也是決定國際局勢的一個主要因素。也就是說，中國的行為方式將給予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日本的任務在於，認清上述必將產生的變化，採取理智恰當的行為，以維持與美國、中國的良好關係。曾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惡夢或是美中兩國發生紛爭，或是美國和中國關係密切。其實，前者的確會帶來一場惡夢，而後者則是我們所盼望的。日本的安全及國家利益，乃至於世界利益，都有賴於中美兩國穩定、友好的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回顧，也有助於日本更深刻地理解面向未來所應該承擔的上述任務。

盛勤 譯

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惡夢或是美中兩國發生紛爭，或是美國和中國關係密切。其實，前者的確會帶來一場惡夢，而後者則是我們所盼望的。日本的任務在於，採取理智恰當的行為，以維持與美國、中國的良好關係。

參考文獻

- 秦郁彥：《昭和天皇的五個決斷》（講談社，1984；文春文庫，1994）。
- 秦郁彥：《南京事件——「虐殺」的構成》（中央公論社，1986）。
- 豬瀨直樹：《昭和十六年夏季的敗戰——總力戰研究所「模擬內閣」關於日美戰爭必敗的預測》（世界文化社，1983；文春文庫，1986）。
- 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7），篠原初枝譯：《太平洋戰爭的起源》（東京大學出版會）。
- 加藤典洋：《敗戰後論》（講談社，1997）。
- 小林吉則：《新傲慢主義宣言戰爭論》（小學館，1998）。
- 小林吉則、竹田青嗣、橋爪大三郎：《正義・戰爭・國家論》（徑書房，1997）。
- 小堀桂一郎：《靖國神社與日本人》（PHP新書，1997）。
- 兒島襄：《天皇 I-V》（文春文庫，1980-81）。
- 小室直樹、色摩力夫：《為了國民的戰爭與和平之法》（總合法令，1993）。
- 森村誠一：《新版 惡魔的飽食——日本細菌部隊恐怖實錄》（角川文庫，1983）。
- 大江志乃夫：《日本參謀本部》（中央公論社，1985）。
- 大江志乃夫：《東亞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立風書房，1998）。
- 岡田英弘：《台灣的命運》（弓立社，1985）。
- 田中正文：《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慧文社，1963，1989年增補改訂）。
- 副島隆彥：《屬國日本論》（PHP研究所，1997）。

橋爪大三郎 1948年生，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現為東京工業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橋爪大三郎選集》（I-III）、《語言遊戲和社會理論》、《佛教的言說戰略》等。